

Mary Brown Bullock, *The Oil Prince's Legacy: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in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xv + 242 pp.

梁加農*

洛克菲勒在華的慈善捐贈，曾在中國現代醫學、科學及教育史上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但目前兩岸三地學界，幾乎沒有研究專著。個中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有關檔案多存於美國，二是涉及敏感的民族主義。

本書作者布洛克（Mary Brown Bullock）是國際學界研究洛氏在華捐贈的先驅和專家，1970年代在史丹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就以此為題。當年洛氏檔案尚未開放，她在保存檔案的倉庫閱讀了有關協和醫學院的檔案；還利用1974年至1978年在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工作時四次隨團訪華的機會搜集資料，將論文整理為協和從成立至1949年的歷史專著《美國式移植：洛克菲勒基金會與北京協和醫學院》。¹2006年她到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擔任研究員後，利用新開放的洛氏檔案，包括會議紀錄、往來函電、私人信件、會計報表，加上對50來位協和醫學院畢業生（所謂「老協和」）的訪談，進一步延伸考察協和1949年後的歷史，並擴展到洛氏在華的全部慈善捐贈，寫成了這部新書。筆者不揣淺陋，略加介紹，

* 加拿大麥格納公司（Magna International Inc.）工程師、六西格瑪黑帶（Six Sigma Black Belt）

¹ Mary B.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試作書評，希望引起更多研究者關注洛氏在華捐贈這一現代中國的重大史事。

本書共六章，第一章「緣起」和第二章「主旨」敘述了 1860 至 1940 年代以石油發跡的美國鉅富洛氏家族，圍繞石油、醫學和藝術品與中國的聯繫及以醫學為主的捐贈活動。1913 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在紐約成立，資本 2.41 億美元，宗旨為關心「人類的健康」。截至 1951 年，該會下設的中國醫學委員會支出 4,400 萬美元，其中用於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有 4,000 萬美元。（頁 29）協和是洛氏僅次於洛克菲勒大學、芝加哥大學的第三大捐贈對象。此外，同期該會還向其他 64 家中國機構提供了合計 1,100 萬美元的資助。（頁 114）

1914 年中國醫學委員會成立後立即在中國展開了調查研究。當時，中國已有外國教會開辦的醫學院 12 家、醫生七百多人。但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院長韋爾奇（William H. Welch）等的調查指出這些機構並沒有達到科學標準。中國醫學委員會接受了韋爾奇等的意見，決定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為藍本，在中國辦一所世界一流的醫學院：英文教學；三年預科、五年本科、再加四年住院醫生培訓；畢業生完全成為國際醫學菁英的一部份。其後撥出 60 萬美元建校資金，在北京買下教會開辦的協和醫學院，新建為北京協和醫學院；1917 年開始招收預科學生；不久後還吸收了劉瑞恆、林可勝、吳憲等「留學歸國」教師；1920 年該院附屬的醫院開始對外門診，其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複製的病歷格式及歸檔制度，後來成為全國標準。（頁 51-58）

除了協和，本書還敘及了洛氏其他在華重要的捐贈項目，如燕京大學生物學系和社會學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及南京的農學等。不過沒有提及現代中國一項具有國際影響的重要科學成就——北京人的發現，是本書的一個遺漏。1927 年，協和解剖科教授步達生（Davidson Black）獲洛氏資助 2.4 萬美元，與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等組織了北京周口店遺址的發掘，發現了牙齒等古人類化石；步氏在《自然》（*Nature*）撰文將之命名為「中國猿人」（*Sinanthropus*）。1929 年 5 月，洛氏追加 8 萬美元資助，設立新生代研究室，步氏為名譽主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畢業生裴文中負責周口店田野工作。12

月2日，裴氏發現第一個中國猿人頭蓋骨。²

第三章「政治」分析了1930至1940年代中國內憂外患對洛氏在華捐贈的影響。1917年至1937年，協和曾享有較為穩定的發展，洛氏其他項目也較為順利。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協和被日本占領軍作為敵產關閉；其後國共內戰，共產黨席捲大陸；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1951年1月23日，中國醫學委員會收到第一位華人院長李宗恩的最後一份電報：「北京協和醫學院被收歸國有」。（頁114）在此前後，洛氏的其他在華捐贈也中斷了。

不過，這裡有一個問題作者沒有深入地展開討論，那就是像協和那樣將大量具有公共性質的教育和醫療資源集中於極少數菁英之作法，在中國社會的實效和反應。在洛氏開始對華慈善捐贈的二十世紀初，中國貧窮落後、缺醫少藥。「人類的健康」在中國亟需的是為大眾提供初步現代醫療服務。洛氏捐贈不可謂不多，但二十年僅僅培訓了三百來位醫生，對四億人口的中國來說只是杯水車薪。雖然，洛氏作為一家外國的私人基金會，不必拘於「政治正確」；然而，其作用卻值得史家思考與重視。

協和無疑是世界一流學府，但是它能代表中國醫學教育的方向嗎？早在1930年代，協和的菁英教育模式便受到廣泛批評。協和畢業生朱章庚主持的醫學教育委員會也建議協和擴大招生、中文教學，「在中國醫學教育的發展上扮演更有意義的角色」。（頁95）1949年後，大陸醫療資源仍集中於中心城市和高級幹部。1965年，毛澤東曾說醫療「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³當然，這已和洛氏無涉，卻是洛氏遺產所在的中国現實。

第四章「存續」集中在協和1949年後的歷史。1949年中國兩岸分治，大多數知識分子選擇留在大陸；其上層選擇離開的相對多一點。如第一屆中央研

² Dora R. Hood, *Davidson Black: A Biography*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4), p.100, 104.

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卷5，頁505。

究院 81 位院士，12 位去了美國（包括林可勝、吳憲），9 位南渡臺灣，其餘留在大陸，留下的約為 75%。北京協和醫學院 1923 年至 1943 年歷屆畢業生合計 313 位，去留與中央研究院院士幾乎完全相同：75% 留在大陸，25% 去了臺灣、美國及世界衛生組織。（頁 125）

朝鮮戰爭爆發後，各項政治運動在大陸相繼展開，協和被指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最大堡壘」。（頁 120）1952 年院系調整，外國開辦的大學，包括燕京及教會醫學院，都被合併到其他大學。但協和例外地存續了下來；其小班級（全院每年招生 30 名）、八年制教學模式，雖備受爭議，卻沒有廢止。然而英文教學已廢止；與美國的學術交流中斷；歷經各次政治運動尤其反右（李宗恩及老協和的 25% 被打成右派）和文革的衝擊，學統受到嚴重影響。1954 年至 1959 年、1966 年至 1979 年都沒有招收新生；就是 1959 年至 1966 年招收的學生，也都沒能完成全部八年制課程。（頁 133、137）

不過，真正展現協和特色的是老協和在中國醫療事業中之領導角色：1950 年代，大陸 12 所主要醫學院的領導、中國科學院 9 位生物醫學學部委員中的 7 位、中國醫學科學院 8 位研究所所長中的 6 位都是老協和或其教師；40% 的老協和擔任了各大醫院行政主管。（頁 125-128）此外，老協和在大陸領導人的醫療上也擔任重要角色，這些特徵本書則幾乎未提及。協和被接管後，部份中堅教師被抽調組建主要為軍政高級幹部服務的解放軍總醫院（301 醫院）。

第五章「續緣」講敘 1970 年代中美和解後，洛氏逐漸恢復了對華捐贈。不過像協和那樣自主辦學已不再可行，捐贈主要在農業、人口等領域。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經濟改善，洛氏停止在華捐贈活動。最後第六章「遺產」是小結。

本書對現代中國的研究有重要價值，也促使我們思考：中國醫學史、科學史、教育史這幾門傳統學科，至少在與中美文化交流史相交叉的範圍內，所面臨的史料、課題甚至敘事方式上的更新問題。布洛克說，不同於「文化帝國主義」的批判或經濟利益的強調，她採用的是入江昭的「文化國際主義」敘事，

即「通過跨國合作和交流尋求重塑國際關係性質的一種思想、運動或組織機構及其制度」。(頁 3) 與布洛克不同，2013 年旅美華裔學者馬秋莎在大陸用中文出版的《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將洛氏捐贈置於近代西方宗教和文化勢力力圖「改變中國」的背景下加以敘述；並謂之「第一本對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中國一個世紀經歷進行綜合論述」的學術專著。此話如果加上「中文」的限定詞，則更為準確；因英文本書此前二年已經出版。看來學界還可以從不同的視角考察，以期對相關問題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